本版编辑：杨志梁
E-mail：m4@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经济学家

储蓄为何等于投资

□ 王东京

关于总供求均衡，经济学有个著名的恒等式：储蓄等于投资。此等式最初由凯恩斯提出，之后便在学界流行，到今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众所周知，上世纪三十年代前，经济学并不分宏观微观，是凯恩斯另起炉灶，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才搞起来宏观经济学。

对经济学要不要分宏观微观，学界一直有争论，不过此非本文重点，这里不讨论。我认为目前亟待研究的是，储蓄等于投资到底是不是总供求均衡的条件。如果是，怎样理解“储蓄等于投资”；如若不是，那么总供求均衡的条件又是什么？这不单是个学术问题，也事关政府调控经济的思路。兹事体大，有必要予以澄清。

我曾说过，所谓“凯恩斯革命”，否定的是萨伊定律。凯恩斯认为，物物交换时代供给可创造需求，但当纸币出现后，供求便不可能自动平衡了。他的根据，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此规律说，随着人们收入增长，消费也会增长，但消费增长跟不上收入增长，令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储蓄增加。若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供求就会失衡。

凯恩斯的这一观点，追随者多，也有不少学者为文支持。目前教科书给出的一致解释是：一个国家假定只有企业与居民两个部门，不存在税收，也没有政府支出和进出口，这样从收入（供给侧）角度看，国民收入=工资+利润+利息+地租=消费+储蓄；而从支出（需求侧）角度看，国民收入=投资+消费。总供求平衡，意味着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消费+储蓄=投资+消费。等式两边都含消费，故左边的储蓄必等于右边的投资。

上述论证看上去逻辑井然、天衣无缝，然而往深处想，这恒等式其实也有疑点，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追问：第一，储蓄的含义究竟为何？是单指居民存款还是包括其他项目？第二，储蓄等于投资是指“事实相等”还是“应该相等”？第三，总供求平衡是否必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凯恩斯《通论》我读过多遍，总觉得他讲得不够清晰且自相矛盾，下面说说我的思考。

先说储蓄。照凯恩斯的说法，收入减消费的余额为储蓄，显然，他讲的储蓄就不只是存款。比如你有10000元收入，3000元用于消费，余下7000元为储蓄。假如7000元储蓄中你用5000元买了字画收藏，用1000元买了股票，剩下1000元存银行，这样看，在凯恩斯那里储蓄是一个比银行存款更宽的概念，我们不妨称为“广义储蓄”。

于是问题就来了，若广义储蓄不单指银行存款，那么储蓄大于存款的部分是什么呢？当然不可能是消费，只能是投资。如上例中居民购买字画收藏与购买股票皆是投资行为，这一点凯恩斯其实也注意到了。问题是储蓄本身包括投资，说储蓄转化为投资岂不是自相矛盾？可见，凯恩斯讲“储蓄转化为投资”时的“储蓄”，并不是广义储蓄，而是狭义储蓄，即居民存款。

再想深一层，如果凯恩斯所讲的储蓄是广义储蓄，而广义储蓄包括投资与存款，这样问题又来了：由于供给侧的国民收入=消费+储蓄=消费+投资+存款，而居民存款是为了从银行取得利息，故存款对居民来讲也是投资。换句话说，居民不仅仅是消费者，同时也是投资者。既然存款也是投资，供给侧的国民收入也就等于消费加投资了。

所以对第二个问题我的观点很明确：从国民收入存量看，“储蓄等于投资”是事实相等。因为国民收入存量是既定量，无论从供给侧看还是从需求侧看，同一个量不可能不等。但若从国民收入流量看，存款是居民投资，但却不是企业投资，存款若不能转为企业投资，总供求流量会失衡。故从流量看，总供求要保持平衡，居民存款（储蓄）需转化为企业投资，即储蓄与投资应该相等。

再谈第三个问题，总供求流量保持平衡，储蓄是否必须转为投资，舍此别无他法？这问题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前面说过，供给侧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存款，需求侧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这样看，要保持总供求流量平衡，存款可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是转为投资；二是转为消费。具体地讲，若投资不足，存款可转为投资；若投资（产能）过剩，存款应转为消费。

放眼看，大量的中外实践证明，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扩内需，储蓄转化为消费也可扩内需。想想消费信贷吧，消费信贷肇始于欧美，今天风行全球，其实就是支持储蓄转化为消费。凯恩斯当年自己说，他主张储蓄转化为投资，是因为投资有乘数效应。可事实上，投资有乘数效应，消费也有加速效应，而且迄今为止经济学并不能证明，对拉动需求扩投资就一定胜于扩消费。

综上可见，“储蓄等于投资”并非铁律，也非总供求均衡的唯一条件。关于总供求均衡，我赞成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社会资本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他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必须坚持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两个平衡。这一思想，我认为才是实现总供求平衡应该遵循的原则。

现在的难题，是怎样实现两个补偿？有一点可肯定，即不能固守“储蓄等于投资”的教条，否则会作茧自缚。当然，我们也不能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统购包销的老路。可取的办法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时政府也要对市场失灵作相机调节。

经济时评

以大数据战略推进分享经济

□ 吴根平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发展分享经济”的概念，并将“网络强国”“大数据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分享经济商业模式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分享经济理念借力互联网大数据在各个行业领域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分享经济，也称共享经济，是将原先由于技术手段或商业模式的限制而无法参与经济领域的生产生活资源，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所创造的商业模式投入到经济活动与经济流通中，重新产生经济价值、创造社会效益的经济模式。互联网平台的分享经济是在数字信息规则下，所有者并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将使用权在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他人，实现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种模式在移动互联网的作用下迅速扩张，形成了分享经济新浪潮。其实商品分享的概念并非最近才出现的，但是借助发达数字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利用互联网将分享经济带到了一个新高度，传统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正在不断弱化，人们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的商品购买方式和服务，转而在互联网上寻找商品分享服务。分享经济是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其快速发展也将带来商业、技术和服务方面的变革，网络技术降低了人们参与成本和共享成本，让人们能比以往更加便捷、快速高效并且价格低廉的获得共享资源，带来消费者之间的分享、交换、借贷、租赁等分享经济行为的爆炸性增长。互联网分享经济为闲置资源创造了市场价值，更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使消费者能以较低价格购买和提供商品和服务，大大降低了分享经济的门槛，资源交易参与方能够在互联网环境中打破时间与空间约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也就是分享经济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创造就业，这在复苏乏力的经济大背景下尤为重要。互联网平台的分享经济虽然改变了分享的模式，但并没有改变分享经济的本质属性即利益共享。

大力发展分享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过去发展主要依赖大量的要素投资驱动，依靠国际市场，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吃了一些资源环境的老本。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出口下降，人口红利在削减，资源能源压力变大，长期以来以投资驱动为主要战略导向，投资回报率在降低，同时也带来了产能大量过剩和社会资源闲置浪费，这种发展模式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严重失调。按照欧盟的研究结论，发达国家资源闲置率达40%，新兴市场国家可能更高。大力发展分享经济可以很好地解决产能重复过剩问题，开拓了重新利用闲置资源和提高配置效率的新视野。我国未来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动力将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依靠大数据驱动，大数据将成为战略性资源，将成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大数据也将是促进生产力变革的基础性力量，以大数据驱动经济发展，重构生产过程，实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分享经济正是大数据驱动下的商业模式创新，它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外部资源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而是充分调动使用现有的闲置资源。大数据驱动发展的分享经济将成为对冲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新动力，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分享经济必将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发展分享经济要排除与分享经济不相适应的信息技术障碍、所有制障碍、既得利益障碍、体制机制障碍等的阻力，打破要素垄断，为分享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但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来自于体制机制的障碍，因为分享经济所需要调动的沉睡闲置的社会资源，往往是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而这些领域都是被传统的地域、行业的管理体制所束缚，无法参与到社会生产的大循环中。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衍生出了固化的管理惰性与管理模式乃至利益藩篱，制约了当前分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空间。由于分享经济促进了整个社会发展，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面对分享经济的浪潮来袭，管理部门要敢于打破传统的管理思维束缚，摈弃现有的管理体制和部门利益。分享经济的核心是信用，它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分享经济由于参与面广，调动资源大，原有政府单一的监管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治理需要，市场秩序的监管和维护将主要依靠和发挥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应该充分利用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媒体、公民监督等社会主体力量实现对分享经济的秩序治理和信用维护。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日趋成熟和完善，也极大地遏制和阻止了信任危机的发生，从而为分享经济保驾护航。分享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起来，取决于新型的治理体系和配套措施的完善程度。发展分享经济还要改变用户的消费习惯和观念，分享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的需求缺口，而推广分享经济最大的挑战则是用户消费习惯的培养，这需要从根本上提升移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质量，提供基于互联网的诚信体系和良好环境。

以大数据战略推进分享经济的发展。大数据和分享经济的关系可谓是一对天然的“孪生兄弟”，分享经济正积极快速地向传统各个行业渗透融合，分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有力支撑，大数据正成为推动分享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大数据”“网络强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将进一步助推分享经济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家层面正在积极布局和实施大数据产业政策，将有力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大数据发展调查报告》预测，2015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将达到1159亿元，增速达38%。预计2016至2018年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还将维持40%左右的高速增长，鼓励大数据行业发展的利好政策亦不断落地。在大数据的黄金时代，大数据的发展为分享经济提供了可靠基础，提高了分享经济发展中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能够快速找出事物间的相关关系，能快速做出决策。各地方政府要着力加快推进大数据建设，加快大数据产业化高速发展，解决各部门之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开放，加强大数据动态的跟踪研究，切实建设数据政策体系、数据立法体系、数据标准体系，围绕大数据进行产业升级和布局，将极大地促进分享经济快速繁荣发展，带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浪潮。

智慧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2015中国智慧城市发展高层论坛综述

□ 杨志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12月19日，由中央党校报刊社和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2015中国智慧城市发展高层论坛”在中央党校召开。来自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信部等部委和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及相关企业的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在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已经出现很多困扰各个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城市病。传统的技术和管理，已经难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本质、城市功能培育、城市结构调整、城市形象与特色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中央党校副校长黄浩涛在致辞中指出，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但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存在着试点失范、政出多门、体制机制创新滞后、网络安全隐患风险突出、思路不清、盲目建设等问题，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推进智慧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多地从实际出发对智慧城市进行了积极实践，但我们对智慧城市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其理论支撑还比较薄弱，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要明确定位、目标和重点。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伍浩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我们在“十三五”时期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新的要求。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是深化改革，包括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公共服务体系和模式改革，社会治理结构和机制改革，通过这些改革打造宜居有活力的新型城市。为了让城市感知更加透彻，让城市管理更加精准，让城市运行更加智慧，让发展更加安全，让人民更加幸福，要重点开展七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跨部门协调机制；二是结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以点带面；三是以双创工作为抓手，为创业者搭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业服务平台，加快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四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大力发展基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商业新业态，增强智慧应用成效，打造高效便捷和全方位线上生活服务圈；五是以大数据治理为核心，深化大数据在智慧政务领域的应用，促进大数据在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产业发展、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创新应用；六是以评价评估为手段，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效果评价，选取一批有代表性的优秀案例进行推广；七是要以国际合作为契机，支持企业走出去，培育国际合作的新领域。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马忠玉从操作层面介绍了国家信息中心在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开展的相关工作。他指出，国家信息中心从2009年开始配合国家发改委及时布局和持续开展智慧城市发展政策、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产业发展、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工作，积极推动我国智慧城市健康发展。2012年组建了一个跨部门、专业化的合作平台——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为了配合国家发改委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工作，指导地方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该中心以创建国内一流的智慧城市专业化研究机构为目标，深入开展了智慧城市发展政策、战略规划、顶层设计等层面的相关研究工作。

我国几乎所有城市都提智慧城市建设，遍地开花，但缺乏秩序和引导，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巡视员兼副局长秦海认为，我国智慧城市还处在初级阶段，应该实现四个方面的结合：一是与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相结合；二是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相结合；三是与现在的信息通讯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相结合；四是要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秦海特别强调了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智慧城市要面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面向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优化产业布局和新型城镇化布局，要有宏观的眼光和微观的细致，来构造整个下一步发展定位；要关注公民隐私，关注国家安全；要有未来的眼光，并树立国际视野。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是不断深化行政职能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过程。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会长、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王彤重点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和城市治理水平的内在逻辑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设提出的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首要遵循，宜居城市是智慧城市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城市化终极阶段，要准确把握城市规划定位，加强对规划的实施情况监督，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改善城市管理体制。

智慧城市是高质量城市化非常重要的途径，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增长，二是推动产业升级，三是优化社会管理，四是普及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鹏提出七条行动建议：第一，要以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智慧城市的内涵和意义，更加重视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升级。第二，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或者为核心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坚决，加快形成泛在、智能的网络空间。第三，要大力发展各种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智慧产业体系。第四，要注重创新要素集聚，培育有利创新要素环境和氛围。第五，要把城市发展，未来智慧城市建设与制造业能够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新型制造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第六，加快能源应用模式和消费模式转变，加快能源互联网和能源经济。第七，以人为本，引进培育高素质人才，加强产业工人和各行业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

华为企业业务政府行业市场总监姚健奎结合近年来华为通过创新ICT方案助力智慧城市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阐述了对智慧城市发展建设的洞察和理解。姚健奎认为，从技术角度而言，智慧城市的建设要点是共享、开放、安全，为了维系城市高效、绿色节能、可持续的发展，借助新一轮信息技术，解决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实现城市管理更安全、更高效、随时响应和智能化。

“互联网+”、时空大数据为智慧城市建设带来又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只有迎接挑战才能抓住这个机遇；数字化是基础，智能化是提升，智慧城市是数字城市功能的拓展和升华；智慧城市是长期战略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系统工程，必须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方法，来解决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回顾了我国从数字城市建设到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阐述了时空大数据的概念，并特别指出要重视时空大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当中的应用。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面临的政策环境是：国家战略日益清晰化、政策布局日益立体化、部际协调逐步协同化。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单志广提出，在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时，要打造特色中国化，破解信息碎片化，避免设计局限化，推进规划发展群带化。

所谓智慧城市就是帮助城市发现需求，创造需求的过程。泛华集团董事长杨天举认为智慧发展就是要根据一个地区的要素禀赋，找到比较优势，确定主导产业、配套产业、机会产业、保障性产业，找到这个地区发展可实现的路径创新。

智慧城市和“互联网+”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卢卫认为，智慧城市要以技术促进产业融合为核心，催生新的业态，让信息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增长活力。

盘古智库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尚宏利表示，政府可以通过开放大数据，通过提供政策的支持和市场准入，让企业能够帮助城市做好相关的城市管理或者城市服务。

此外，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成名重点介绍了时空信息云平台的概念、特点和功能，该平台可以在智慧城市阶段，给智慧城市提供一个带有时间的地理信息统一云环境。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副主任景贵飞详尽介绍了羲和系统的精准定位服务如何助力智慧城市建设。沈阳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李莹介绍了沈阳市智慧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在下午的圆桌论坛上，嘉宾围绕五大发展理念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交流。王家耀认为智慧城市建设要实现思维创新、技术创新、理念创新和运营模式创新。卢卫表示打造智慧城市，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政府要做好规划、出台政策、保障安全、适度监管，企业要通过市场化运作让政府规划和政府政策能够落地，而市民则要提出需求和学会应用。单志广补充道，中国最大问题是协调，谁来定义协调的功能，谁来负责协调的职责，如果把所有希望放在市长、书记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认为开放的环境下，要明确政府的边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大数据没有边界，城市会让生活更恐怖。要重视智慧城市带来的资产，对城市运营带来的价值，要以市场为主体，才可能实现资产最大化，智慧城市质量会越来越好。杨天举提出，智慧城市发展要有一个科学发展模式，以科学发展模式为旗帜，以项目做抓手，以构建全体功能体系做平台，以金融做翅膀，以信息化为手段，重构商业生态圈，以产业为本解决方向问题，以文化为本解决地方软实力问题，大家同唱一首歌，才能实现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中信国安城市运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成波认为，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打破部门利益，实现数据共享，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思想问题。国家部委要有密集政策出台，统一思想。作为企业和供应商来讲，一定要让部门的领导，部门执行者，看到共享之后的好处。

中央党校报刊社总编钟国兴在论坛总结发言时指出，本次论坛探讨智慧城市的理念、原则、问题时，各位专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五大发展理念，说明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问题和中央的各个方面要求是非常契合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落实中央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反过来说，五大发展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智慧城市建设，所以我们探讨的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落实中央的会议精神，是结合智慧城市这个载体，从而具体地、深入地、系统地来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

中央党校信息中心主任王金龙等出席会议，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杨英杰、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单志广先后主持了论坛。

热点透析